



陪都

文学论

郝明工 著



陪都

文学论

郝明工 著

责任编辑:李 惠

装帧设计:雅思雅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都文学论/郝明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1-017867-7

I. ①陪… II. ①郝… III. ①地方文学史-文学史研究-重庆-现代

IV. ①I209.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767 号

陪都文学论

PEIDU WENXUE LUN

郝明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225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ISBN 978-7-01-017867-7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代序

区域文学刍议

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作为民族国家之内文化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分野现象，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版图上如此明晰地呈现出来，以至于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上存在着的研究对象。

具体而言，对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当下研究，已经从抗战区扩展到沦陷区；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当下研究，也由大陆扩展到台湾地区与香港地区。实际上，面对 20 世纪以降中国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现实存在，如何在以之为对象的研究之中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思考，以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势必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学术话题。

所幸，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中国存在为这样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这就促使应该进行的理论思考不至于流为随意虚构的理论高蹈，在为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提供专门的研究方法与阐释工具的同时，也就同样有可能为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乃至学科建构，提供一次并非无益的尝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保障有关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学术对话得以顺利进行，理应对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这两个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阐释，以便有助于不同个人思考之间的学理交流与交锋，以期能够在达成某种学术共识的前提下，推进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研究的发展。

如果对区域文化进行的认识需要基于大文化观，那么，对区域文学的把握则需要基于大文学观，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文本联系能够得到一种基于历史的审美阐释。这不仅是因为区域文学是对于区域文化的文学性表征，更是因为区域文学对于区域文化的文学性表征具有着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内涵。所谓区域文化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中存在着的，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着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阶段性文化现象。在这样的意义上，也就可以对区域文学现象的出现进行如下初步描述：在以区域文化为对象的文学审美过程中，以区域文化的现实存在为基础，通过区域文学的产生而成为区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促成区域文化发展的同时推进区域文学的自身发展。

从区域文学的文本存在来看，实际上拥有两大文本系统：口头语言文本与书面语言文本，两者的代表分别是：前者主要是由民间采风而来的文本，是关于集体创作的口头流传文本的文字记录；后者主要是由专人写作而来的文本。是个人创作的书面传播文本的文学书写。这两大系统的文本的写作，不仅呈现出由集体创作向着个人创作进行转换的趋势，而且也相应地表现出由民间流传向着大众传播进行转换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从区域文学的文本构成来看，具有着纵横两个蕴含向度：

横向的蕴含向度表现为对于区域文化从睿智的哲思到激情的迷狂，而纵向的蕴含向度则呈现为对于区域文化从现实的观照到历史的追溯。这样，区域文学对于区域文化进行的文本表达之中，已经促使地域文学的产生与地方文学的出现之间形成了趋向一致的可能性，最终成为区域文学的存在现实。

区域文学中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二分，与区域文化中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二分相对应，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之间的本质性深层内涵关系。因此，在地域文学与地区文学之间，将表现出不同的文本特征。首先，地域文学的文本存在具有两大文本系统，并以书面文本为主；而地域文学的文本构成以地域文化为对象，并以横向的蕴含向度为主，因而无论是从文本的写作到文本的传播，还是从文本的对象到文本的蕴含，都将受到意识调控与行政调控的种种约束。其次，地方文学的文本存在也具有两大文本系统，且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并重；而地方文学的文本构成以地方文化为对象，并以纵向的蕴含向度为主，因而无论是从文本的写作到文本的传播，还是从文本的对象与文本的蕴含，都将受到人文基础与民族特征的种种影响。所以，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之间，两者的审美自由度，由于外来的地域文化干预与内在的地方文化局限，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异的出现。

这一差异源自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的文化内涵的不同，从而体现出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基本构成差异。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都同样具备着文化内涵的二分。就地域文学而言，具备了意识文化导向与地区文化限度这样的文化内涵二分：意识文化导向是意识文化现实追求的文学表现，而地区文化限度是地区文化辖区边际的文学表现，从而显现为从政治意向到行政体制对于地域文学的可能限制。

就地方文学而言，具备了地缘文化特性与民族文化底蕴这样的文化内涵二分：地缘文化特性是地缘文化历史发展的文学表现，而民族文化底蕴是民族文化传统延续的文学表现，从而显现为从风土人情到风俗习惯对于地方文学的潜在制约。

这样，区域文学的文化内涵分为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的不同层次。根据这些不同层次在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兴衰过程之中展示出来的历史稳定性，这四者之间形成了从表层到深层的层次构架，也就是意识文化导向是区域文学最表层的文化内涵，而后由地区文化限度到地缘文化特性逐层深入，直到民族文化底蕴的最深层，表现出从变动不居到稳固更新的层次特征，并且显现出层层递进的可能相关，从而形成了区域文学中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之间的文化内涵层次区分。

由此可见，从地域文学到地方文学，由于存在着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的层次差异，不仅会继续保持着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特征性影响，而且将独自表现出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的可能性发展，从而使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能够通过文化内涵的互动与互补，在地方文学的历史基础上与地域文学的现实发展相融合，实现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兼容并包，从而使之成为具有体制性政治色彩与实存性民俗风貌这两大基本特点的区域文学现实。至此，可以对区域文学进行第一次描述性的界定：所谓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

由于在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之间保持着在文化内涵上的有机构成关系，因而在区域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区域文学的一般特点之间，形成了对应性的关系。具体而言，一方面就是地域文化的时期性与波动性特征，

将直接表现为地域文学的地域变动性，不仅地域文学的性质随着意识文化导向的转变而转变，而且地域文学的边际随着地区文化限度的调整而调整，因而使之成为区域文学是否出现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地方文化的长久性与累积性特征，将间接体现为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在地方文学的人文资源为地缘文化特性所固定的同时，地方文学的语言表达也为民族文化底蕴所决定，因而使之成为区域文学能否存在的一个根本性因素。这样，地域文学与地方文学之间正是从不同文化内涵层次上，展示出区域文学一般特点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地域文学以地方文学为历史根基，而地方文学以地域文学为现实样态。

地域文学的地域变动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直接表现为意识调控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学政策的制定，来进行调控以确定区域文学发展的可能限度；另一方面直接表现为行政调控的有效性，即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进行调控以确认区域文学发展的有效空间。无论是文学政策的制定，还是行政区划的调整，都拥有着政治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体制性的政治运作所产生的社会制约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地域文学是一种政治性的区域文学现象，因而从地域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实质上也就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时期之中文化发展的政治性需要。

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另一方面间接体现为民族语言的体系性，即进行民族语言发展，来提供必要的语言表达符号以推动区域文学的形成。从人文资源根基到语言表达符号，都拥有着地方性的基本内容，表现为人文性的语言运用所产生的群体影响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

说地方文学是一种地方性的区域文学现象，因而从地方文学到区域文学的现象性存在，实质上取决于民族国家在特定环境之中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表达。

由此可见，区域文学的一般特点具有着地域变动性与地方永久性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体化为意识调控的可能性、行政调控的可行性、人文基础的历史性、民族语言的体系性，进而形成了有关区域文学一般特点的，从政治性需要到地方性表达这样的文化内涵层次的两极区分，由此赋予了区域文学以政治性与地方性这样的文化存在关系标志。一旦区域文学在国家范围内成为从政治性需要到地方性表达的文学典范，区域文学也就具有了国家代表性。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对于区域文学也就可以进行描述性的再次界定：所谓区域文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中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是地域文学的政治性需要与地方文学的地方性表达趋于一致的文学现象。

如果能够从这样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界定出发，来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版图进行从古至今的扫描，或许，至少对于古代中国出现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现象的研究来说，无论是以国名、朝代，还是以地名、州郡，来进行区域性区分，往往可能会发现：那些当初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命名，作为历史现象，已经失去了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面貌，而仅仅保留着地方文化与地方文学的风貌，这就需要进行现象性的历史还原，以求在有关研究过程中能够逼近它们的原貌，进行合乎学术规范要求的研究。

同样，就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而言，一方面人们对于已经存在着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现象，似乎应该直接去面对并且进

行把握，而不应该围绕着它们，仅仅从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某一层面上出发来进行外围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于现存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的综合研究，将能够形成与之相应的具有体系性的研究方法与阐释工具，以便对于那些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现象提供一种理论性参照。

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之下，通过对于中国现存的区域文学进行综合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与之相对应的具有范式意义的体系性研究方法与阐释工具，以便对今后那些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探讨。

目 录

区域文学刍议(代序).....	1
导言 以陪都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运动	1
一、大后方的文学诉求	1
二、大后方的文学传播	18
第一章 陪都文学的文化特征	33
一、文学发展的战时性	33
二、文学导向的主流性	46
三、文学蕴含的地方性	59
第二章 陪都诗歌的多样选择	74
一、震撼人心的诗歌	74
二、心潮澎湃的抒情长诗	93
三、人生追溯的叙事长诗	100
第三章 陪都小说的史诗建构	110
一、力求真实的小说	110
二、挖掘人性的中短篇小说	122
三、重塑人格的长篇小说	134

第四章 陪都散文的战时写照	144
一、纪实生活的散文	144
二、贴近战争的报告文学	157
三、亲历人世的散文小品	171
第五章 陪都话剧的全民动员	181
一、上下求索的话剧	181
二、直面生活的现实剧	194
三、实事求是的历史剧	205
第六章 陪都文论的主义论辩	214
一、“新现实主义”	214
二、“民族文学运动”	226
三、“现实主义在今天”	236
余 论 现代文学的区域分化	246
一、20世纪的中国文学	246
二、现代文学的区域机制	261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79

导言

以陪都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运动

一、大后方的文学诉求

何谓大后方？根据持久抗战与抗战到底这一战略与政略相一致的中国需要来看，所谓大后方也就是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包括以桂林、昆明、贵阳、成都、西安、兰州、迪化（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城市为地方首府的广大区域。由于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与生活相对稳定，这就保障了抗战文学运动较为正常的开展，有利于文学运动的战时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大后方文学运动显示着抗日战争中全国文学运动的总动向。

随着国民政府的迁渝，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代表的众多全国性文艺团体也迁往重庆，“在完整区域的总后方，文艺活动应该有努力加紧的必要，由于出版条件的具备，优秀作家的集中，那儿应该是指导中枢的所在。会刊《抗战文艺》应该负起指导全国文艺作家在抗战中一切活动的任务，拿我们创作的笔，扫荡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加强抗战的力量，培养革命的新世代”，“使整个的文艺活动参加到民族

解放这一伟大的事业里面，使民众理解抗战这一神圣事业固有的革命性质，动员他们起来，贯彻抗战的目的。要使偏远的地方也能听到炮声，也能看见浴血抗战的现实！也要使全世界关心我国抗战的人士，能够看得见中华民族新的典型”！每个人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怎样使文艺在抗战上更有力量？”

然而，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却并非如问题的提出那样简单。一方面，“因为问题是实际的，所以由一开头直到今天横在面前的老是那两座无情的山：‘看不懂’是一座，另一座是‘宣传性’。三年来所有文艺作品与文艺讨论都是要冲过这两重山去。不冲过去即无力量可言，因为读众的读书能力的低弱，与抗战宣传的急迫，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另一方面，“在文艺者的心里，一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当他们看见那两重山哪，最初是要哭；后来慢慢地向前试步，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混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为两栖动物的时节——怎能既深刻又俗浅，既是艺术的又是宣传的呢”？

老舍俗白而又生动地刻画出文艺工作者的两难窘境，他又立足于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高度简洁而又剀切地指出：“大家开始有个共同的领悟，就是假如完全照着旧模式与宣传文字已经有点效果，那么何妨再进一步而使新的样式也设法使民众能接受呢。”“是呀。俗而深，宣传艺术平衡，不扔掉旧传统（起码须谈中国话）也不忽视世界的新潮（不关上大门打仗啊），这不是最自然最光明的中国新文艺——新中国的文艺——的道路吗。”^①实际上，这已经揭示出文艺发展中民族传统与时代

^① 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大公报》1940年7月7日。

新潮相一致的必然性趋势。

王平陵从文艺创作的角度作出了进一步的设想：“抗战文艺应该比舆论跨进一步，站在舆论之前”；“必须更关心政治，从希望政治进步出发去严正地批评政治”；“描写战争，表现战争仅仅是抗战文艺的一面，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是描写生产建设，表现生产建设。”总之，“文艺作家的任务，固然在于写作优秀的作品，但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能领导当代的思潮”。^①

与此同时，郭沫若更是对文艺工作者的现状进行了客观的评估：“现在作家们只是单纯地从正面地、冠冕堂皇地写抗日文艺，有时也不免近于所谓公式化，以后应该拿出勇气来，即使是目前所暂时不能发表的作品，也要写出来，记下来。这所写的才配称为真正的新现实，能够正确地把握这个新现实，才能产生历史性的作品。”这就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要求发扬个人主体性，把握时代脉搏。^②

从上述对于大后方文学运动总动向的不同角度的既成认识，可以看出抗战前期中国文学运动主要是围绕着文艺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抗战而波澜起伏。因此，一是应该注意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状态中，文艺服务于抗战，高于一切；二是不要忽视抗战文艺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也应表达出对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然而，在急迫中，他们怀着惶惑而兴奋的心情去描写、去刻画、去反映自己尚未熟悉的抗战，停留在生活的表面上为写抗战而写抗战，就

① 王平陵：《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会报座谈会）》，《抗战文艺》第7卷1期，1941年1月1日。

② 郭沫若：《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会报座谈会）》，《抗战文艺》第7卷1期，1941年1月1日。

难免陷入公式化的泥潭，抗战文艺从急就章而急救章，成为面目可憎的抗战八股；于是，他们带着委屈俯就的心态，去发掘、去选择、去利用自己颇不以为然的民间旧形式，勉为其难地借此进行民众动员，在大众化的口号下为通俗而通俗，仍难以化解新文艺与民间文艺之间的隔膜，旧瓶中酿成难以下咽的新酒，非但未能添色增香，反而成为辛酸的反讽，形成文艺表现的不真实。

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也认识到抗战文艺必须是真实的，也能够是真实的。首先，“真正所谓抗战，应该包括抗战建国的整个过程”，“前方的文人描写前方的生活，后方的文人表现后方的生活”。“写自己所知道的是创作的基本条件。后方文人表现后方生活，即使技巧拙劣的作品，亦较表面上说得天花乱坠而骨子里都是空想出来的前线抗战作品，来得真实而较动人。别的不谈，起码他是忠实地写他所知道的。”^①其次，通俗化“不仅是技巧问题，不仅是文艺作者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许多的社会问题有着联系的”。但其首要问题即必须明确：“内容是现实的为大众所了解而且需要的。形式是大众所懂得所习惯的新的或者旧的。”同时，“通俗化不是庸俗化，所以通俗文艺决不是粗制滥造，不是低级趣味的渗和，不是淫词滥调的堆砌，更不是空虚的浅薄意义的反复。”“作家应该懂得大众，向大众学习”。^②

文艺服务于抗战，不仅仅限于文艺工作者如何把握战时生活与文艺形式，实际上还对他们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要求。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较早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必须根据战时生活的具体样态，揭示其纷繁表象之下的底貌：“对于抗战中所发生的残酷、动摇、痛苦、快愉等，应

① 柳青：《后方文人的苦闷及其出路》，《中央日报》1939年2月1日。

② 戈浪：《文艺通俗化诸问题》，《中央日报》1938年11月26日。

有系统的研究、剖解，而同时加上丰富的想象力。以想象来创造文字，热情处当热情，冷静处当冷静，要歌颂也要批判，这样才实际而有情绪，才是有血有肉的表现”，“至于歌颂与批判并不含有‘捧’与攻击的意义。应该是有理性的检讨与鼓舞的。这，使我们的内部走向更完整更有力的方向”。^①

1938年底，随着所谓华威先生“出国”事件的发生，^②促进了大后方文艺工作者对文艺能否暴露与讽刺抗战阵营中的阴暗面与消极面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讨论开始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或主张仍应以颂扬光明为主，或要求不应讳疾忌医，但随着讨论的继续，讨论的焦点不再是应不应该暴露与讽刺，而是应该怎样去进行：“因为有暴露才有改进，姑息，适足以养奸。但是于方法方面，却还要郑重考虑一下。这个时代，应该是建设第一，不应该单是大骂一顿或是讥讽一下了事，应该指示他一个光明的前途，这才叫作真正的‘暴露’。”^③对于这一点，已成为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的共识：要求暴露黑暗做得“恰到好处”，“不但要不妨害抗战，而且要有益于抗战”，^④必须注意“如何暴露这手法上的问题”。^⑤

这就将讨论推向了在文艺创作中如何描写否定性人物：以“暴露”的形式来揭穿隐藏着的、披着爱国者画皮的反对抗日与民众的敌人；以“讽刺”的形式来揭破隐饰着的麻木、自私、卑鄙而又侈谈抗日者；以

① 佳禾：《歌颂与批判》，《新民报》1938年3月7日。

② 张天翼：《华威先生》，《文艺阵地》第1卷1期，1938年4月16日；同年11月，日本《改造》杂志翻译发表，由此引发争议——对国人抗战应该怎样进行文学把握，以避免各国读者的误读。

③ 陈莱：《关于“暴露”之类》，《新民报》1939年4月27日

④ 何容：《关于暴露黑暗》，《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7期，1939年7月16日。

⑤ 郑知权：《论暴露黑暗》，《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10、11期合刊，1939年9月16日。